

汉唐经营西域目的比较

李锦绣

〔摘要〕 两汉的西域经营,主要是为了制匈奴。“断匈奴右臂”,一直是两汉经营西域的主旋律。唐代经营西域,不是作为断突厥右臂之一环,而是作为国家西北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的为在西域行使主权。唐代经营西域的目的不同于两汉,除汉唐内陆欧亚政治军事不同的大背景外,还有三种原因:唐代实行“关中本位政策”,与唐朝视西域为手足、枝叶的认识不同;自汉以来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经营,促进了西域对汉文化和中原王朝的文化认同“华夷一家”的思想,成为唐在西域开拓进取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 汉;唐;西域;突厥

〔中图分类号〕 K28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3(2014)04—0050—08

〔作者简介〕 李锦绣,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00732

两汉经营西域的目的,余太山先生在《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一书中已有深入论述。^① 西汉的西域经营目的是“断匈奴右臂”。^②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尽管具体使命不尽相同,但联络乌孙,共同抗击匈奴,则是主要目的。随着西汉取得河西战争的胜利,在河西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汉与西域直接相连,其势力逐步向西域渗透,汉匈力量对比朝有利于汉的方向转化,西汉所谓“断匈奴右臂”便从联络乌孙之类西域盟国,演变为驱逐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取代匈奴控制西域。

在与西域联合抗击匈奴之后,西汉进一步深入,两次出击大宛,与匈奴争夺楼兰、车师,兴屯田,设西域都护、戊己校尉,逐步统一西域。出兵大宛体现了西汉“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治国理想,^③这是西汉经营西域的终极目的。作为汉与大宛战争导火索的“天马”,使汉发兵大宛更具有了“求异物”的色彩。但联系到当时西汉与匈奴争夺西域的局势,汉两次大举进兵大宛,更是从西向东包围西域、以彻底实现“断匈奴右臂”战略的一环。汉对大宛战争的胜利,直接削弱了匈奴在西域的影响,成为西汉进兵西域的先声。因而西汉经营西域的目的,主要是制匈奴、“断匈奴右臂”;而重九译、致殊俗、广地万里,使威德遍于四海,则是经营西域的客观效果。

东汉的西域经营,较西汉消极。东汉的西域经营其目的主要是制匈奴,保河西。兹引陈忠、班勇的议论以为说明。《后汉书》卷88《西域传》云:

尚书陈忠上疏曰:“臣闻八蛮之寇,莫甚北虏。汉兴,高祖窘平城之围,太宗屈供奉之耻。故孝武愤怒,深惟久长之计,命遣虎臣,浮河绝漠,穷破虏庭。当斯之役,黔首隕于狼望之北,财帛糜于卢山之壑,府库单竭,杼柚空虚,算至舟车,赍及六畜。夫岂不怀,虑久故也。遂开河西四郡,以隔绝南羌,收三十六国,断匈奴右臂。是以单于孤特,鼠窜远藏。至于宣、元之世,遂备蕃臣,关徼不闭,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难以化狎。西域内附日久,区区东望扣

① 详见余太山《西汉与西域》,《东汉与西域》,载《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71—73、128—130页。本文所论两汉经营西域目的,均根据余先生论述。

②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第3168页。

③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6页。

关者数矣,此其不乐匈奴慕汉之效也。今北虏已破车师,势必南攻鄯善,弃而不救,则诸国从矣。若然,则虏财贿益增,胆势益殖,威临南羌,与之交连。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赀之费发矣。议者但念西域绝远,恤之烦费,不见先世苦心勤劳之意也……臣以为敦煌宜置校尉,案旧增四郡屯兵,以西抚诸国。庶足折冲万里,震怖匈奴。”^①

《后汉书》卷47《班勇传》云:

勇上议曰:“昔者孝武皇帝患匈奴强盛,兼总百蛮,以逼障塞。于是开通西域,离其党与,论者以为夺匈奴府藏,断其右臂。遭王莽篡盗,征求无厌,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兴,未遑外事,故匈奴负强,驱率诸国。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诸郡,城门昼闭。孝明皇帝深惟庙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远遁,边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内属。会间者羌乱,西域复绝,北虏遂遣责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直,严以期会。鄯善、车师皆怀愤怒,思乐事汉,其路无从。前所以时有叛者,皆由牧养失宜,还为其害故也……旧敦煌郡有营兵三百人,今宜复之,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阗心胆,北扞匈奴,东近敦煌,如此诚便。”

长乐卫尉谭显、廷尉掾母参、司隶校尉崔据难曰:“朝廷前所以弃西域者,以其无益于中国而费难供也。今车师已属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朝反覆,班将军能保北虏不为边害乎?”勇对曰:“今中国置州牧者,以禁郡县奸猾盗贼也。若州牧能保盗贼不起者,臣亦愿以要斩保匈奴之不为边害也。今通西域则虏势必弱,虏势弱则为患微矣。孰与归其府藏,续其断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抚西域,设长史以招怀诸国,若弃而不立,则西域望绝。望绝之后,屈就北虏,缘边之郡将受困害,恐河西城门必复有昼闭之儆矣。今不廓开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费,若北虏遂炽,岂安边久长之策哉!”大尉属毛轸难曰:“今若置校尉,则西域骆驿遣使,求索无厌,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一旦为匈奴所迫,当复求救,则为役大矣。”勇对曰:“今设以西域归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汉,不为钞盗则可矣。如其不然,则因西域租入之饶,兵马之众,以扰动缘边,是为富仇雠之财,增暴夷之势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系诸国内向之心,以疑匈奴觊觎之情,而无财费耗国之虑也。且西域之人无它求索,其来入者,不过廩食而已。今若拒绝,势归北属,夷虏并力以寇并、凉,则中国之费不止千亿。置之诚便。”^②

陈忠、班勇是东汉力主开通西域者。从二人议论可知,汉武帝开西域,为解决匈奴的侵扰。开通西域的结果,截断匈奴右臂。“断匈奴右臂”包括两重含义:一是在军事、政治上隔断匈奴和西域的联系,防止匈奴利用西域兵马,夹击河西。二是从经济上削弱匈奴。西域绿洲国是匈奴游牧经济的重要补充,诸国地处丝绸之路要道,国家富庶。汉控制西域,则防止匈奴在西域诸国财富的支持下,如虎添翼,发动大规模战争。因而,两汉经营西域,含有“夺匈奴府藏,断其右臂”两重目的。其根本之点,即控制匈奴。

综上所述,两汉的西域经营,主要是为了制匈奴,进而保护国家安全,维护边防安宁。因而“断匈奴右臂”,一直是两汉经营西域的主旋律,伴随着两汉经营西域的兴衰与起伏。

唐代经营西域的目的,与汉朝不同。这是由唐代的政治军事形势及内陆欧亚的历史状况决定的。

开元五年(717年)五月,唐册立勃律国王苏弗舍利支离泥为勃律王,册文有“谢知信由其远略,郭虔瓘所以足兵,行观郁成授首,何止匈奴断臂”句。^③“何止匈奴断臂”不仅是勃律在唐西北边防地位的写照,而且概括了唐经营西域的目的。也就是说,唐经营西域,与汉代“断匈奴右臂”的目的不同。

唐代北边面对的最强游牧势力是突厥,汉代的匈奴已为唐代的突厥取而代之。突厥兴起后,迅

① 《后汉书》卷88《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点校本,第2911—2912页。

② 《后汉书》卷47《班勇传》,1587—1589页。

③ 《册府元龟》卷964《外臣部·封册二》,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72页。

速向东西方扩张,到木杆可汗(553—572年在位)时期,“又西破嚧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其地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①,建立了东西万里,南北五六千里,横跨亚洲的强大统一的游牧汗国。隋开皇元年(581年),随着佗钵可汗(572—581年在位)去世,突厥纷争不断。在隋“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分化瓦解政策下,东西突厥互相攻击,势同水火。隋末始毕可汗(611—619年在位)即位,“值天下大乱,中国人奔之者众,其族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②。但西域仍由西突厥控制,统叶护(617—628年在位)“勇而有谋,善攻战。遂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鬲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又移庭于石国北之千泉。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西戎之盛,未之有也”^③。东突厥经常大举南下,成为新建立的唐朝的心腹之患。

唐初仍奉行隋“远交近攻”的政策,联络西突厥,以达到牵制东突厥的目的。《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传》记载:

武德三年,统叶护遣使贡条支巨卵。时北突厥作患,高祖厚加抚结,与之并力以图北蕃,统叶护许以五年冬。大军将发,颉利可汗闻之大惧,复与统叶护通和,无相征伐。统叶护寻遣使来请婚……高祖遂许之婚,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国,统叶护大悦。遇颉利可汗频岁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为婚……颉利可汗不悦中国与之和亲,数遣兵入寇,又遣人谓统叶护曰:“汝若迎唐家公主,要须经我国中而过。”统叶护患之。未克婚。^④

据此可知,唐初欲与西突厥联手对付东突厥,而东突厥千方百计破坏唐与西突厥的联合。

唐朝的北疆局势,与汉时不同。唐无断突厥右臂的问题。自突厥分裂为东、西突厥以来,二者之间频繁战争,没有联合进攻中原王朝的可能性。唐初,西突厥与唐保持友好关系,甚至一度达成了夹击东突厥的协议。对唐最大的威胁是东突厥,而由于西突厥的存在,东突厥也无力向西扩张,进入西域。突厥分裂后,不待隋唐经营西域,东突厥的右臂已自断。因而唐代经营西域,已不是如汉朝一样为断匈奴(突厥)右臂,而是另有深层目的在焉。

汉武帝时期的重九译、致殊俗、广地万里,使威德遍于四海,也不是唐(至少不是唐初)经营西域的主要目的。《贞观政要集校》卷9《论征伐第三十五》略云:

贞观五年,康国请归附。太宗谓侍臣曰:“前代帝王,大有务广土地,以求身后之虚名,无益于身,其人甚困。假令于身有益,于百姓有损,朕必不为,况求虚名而损百姓乎!康国既来归朝,有急难不得不救。兵行万里,岂得无劳于人?若劳人求名,非朕所欲。所请归附,不须纳也。”^⑤

唐太宗不务广土地,以求虚名,拒绝了康国的归附之请。可见唐初太宗对重九译、广地万里,使威德遍于四海的虚名并不积极追求。对致殊俗和异物,唐代君臣也并不热衷。《册府元龟》卷168《帝王部·却贡献》记载:

太宗贞观五年,新罗献女乐,帝不受,并五色鹦鹉,各令将还本国。

咸亨二年五月,周澄国遣使上表云:“诃迦国有白象,首垂四牙,身运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丰,既有威灵,又弭灾患。力兼十象,强制百人,以水洗牙,饮之愈疾。请发兵迎取以献之。”

① 《周书》卷50《异域传下·突厥》,中华书局1971年点校本,第909页。参见《北史》卷99《突厥传》,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3287页。《资治通鉴》卷166梁敬帝绍泰元年(555)十二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点校本,第5140页。《册府元龟》卷958《外臣部·国邑二》,第11104页。《通典》卷197《边防一三·突厥上》,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第1068页。

② 《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5153页。参见《通典》卷197《边防一三·突厥上》,第1069页;《资治通鉴》卷185唐高祖武德元年(618)五月条,第5792页。《唐会要》卷94《北突厥》,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687页。

③ 《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传》,第5181页。参见《通典》卷199《边防一五·突厥下》,第1077页。《册府元龟》卷1000《外臣部·强盛》,第11569页。

④ 《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传》,第5181—5182页。

⑤ 《贞观政要集校》,谢保成集校,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76—477页。

帝谓使臣曰“舜用漆器而人叛,纣用玉杯而国亡,此亦所费不多,但是奢丽之渐不可启也。夫作法于俭,其弊犹奢;作法于奢,岂能制止?故圣人越席以昭俭,茅茨以戒奢。《书》云‘珍禽奇兽,不育于国。’方知无益之源不可不遏。朕安用奇象,令其远献!”乃劳其使而遣之。^①

太宗拒绝女乐和鹦鹉、高宗拒绝奇象,展示唐初皇帝对异物的态度,尤其是却奇象一事,更体现了高宗不好殊俗、不贵珍异的特点。对西域的进献,唐皇帝也多次不受珍异奇物。同书同卷又云:

开耀元年十二月,吐火罗进金衣一领,帝不受。

玄宗开元五年,以康、安国、突骑施等贡献,多是珍异,谓之曰“朕所重惟谷,所宝惟贤,不作无益之费,不贵远方之物。故锦绣珠玉,焚于殿庭;车渠玛瑙,总赐蕃国。今之进献,未识朕怀。宜收其情,百中留一,计价酬答,务从优厚。余并却还。”是年,突骑施遣使献橐驼及马。降书谓曰“卿远贡忠信,请献驼马,朕玄默为神,淡泊为德。税彼部落,则有劳费,已敕有司,不令辄受。深领厚意,宜体至怀。”

这是两次唐帝却西域之贡献。“不贵远方之物”,正是对唐代经营西域不是为了远方珍奇异物的概括和总结。

唐经营西域,不是为了万国来朝的虚名,也不是为了异物毕至的繁荣。唐太宗所谓“假令于身有益,于百姓有损,朕必不为,况求虚名而损百姓乎!”表明唐太宗着眼于国家的利益,百姓的利益。易言之,唐经营西域,是求实利。这种实利是什么呢?

这需要结合唐代经营西域的方式和效果来分析。《旧唐书》卷198《高昌传》记载,太宗欲出兵高昌时,“公卿近臣皆以行经沙碛,万里用兵,恐难得志,又界居绝域,纵得之,不可以守,竟以为谏,太宗皆不听”。^②《旧唐书》卷69《侯君集传》岑文本上疏,也称“高昌昏迷,人神共弃。在朝议者,以其地在遐荒,咸欲置之度外。唯陛下运独见之明,授决胜之略,君集等奉行圣算,遂得指期平殄。”^③可见出兵高昌和建立西州,都是唐太宗力排众议制定的政治军事战略。这一天机独断,展示了太宗的远见卓识,也体现了唐太宗经营西域的苦心孤诣。出兵高昌,为建立西州。西州的建立,不仅为唐提供了经营西域的前沿根据地,而且第一次将丝绸之路的门户高昌纳入中原王朝的建制之内,使其成为大唐领土的一部分。控制西域,实现对西域的主权,在太宗看来,才是经营西域的实利。这远比万国来朝的虚名和远国纳贡的珍异之物重要得多,这正是唐经营西域的根本目的。

唐太宗对西域的认识,还可以再引史料说明。《贞观政要集校》卷9《议安边第三十六》记载: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平高昌之后,太宗欲以其国为州县。魏征曰:“……所谓散有用而事无用,臣未见其可。”太宗不从,竟以其地置西州,仍于西州置安西都护府,每岁调发千余人,防遏其地。黄门侍郎褚遂良亦以为不可,上疏曰:“……陛下诛灭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鲸鲵,以为州县……设令张掖尘飞,酒泉烽举,陛下岂能得高昌一人斗粟而及事乎?终须发陇右诸州,星驰电击。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以腹心,彼高昌者他人手足,岂得糜费中华,以事无用?……宜择高昌可立者,征给首领,遣还本国,负戴洪恩,长为藩翰。中国不扰,既富且宁,传之子孙,以贻后代。”疏奏,不纳。^④

唐太宗以高昌置州县,遭到魏征、褚遂良的反对。朝臣反对的原因,是“彼高昌者他人手足”,高昌是国家枝叶,与中原、河西不同,后者才是国家的根本和腹心。因而,高昌只可羁縻,不能设置州县,不值得派兵。唐太宗不顾“糜费中华”之议论,派兵驻守,是因为太宗也视高昌为腹心,高昌也是中华的一部分,因而“竟以其地置西州”。设置西州,对西域真正进行控制,行使主权,使其成为华夏的一

① 《册府元龟》卷168《帝王部·却贡献》,第1868页。

② 《旧唐书》卷198《高昌传》,第5295页,参《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传上·高昌》,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6221页。

③ 参《唐会要》卷95《高昌》,第1703页,《册府元龟》卷531《谏诤部·规谏八》,第6056页,《文苑英华》卷697岑文本《为侯君集疏》,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3595页。

④ 《贞观政要集校》,第506—508页,参《唐会要》卷95《高昌》,第1701—1703页,《册府元龟》卷1000《外臣部·亡灭》,第11575页,《旧唐书》卷198《西戎传·高昌传》,第5294—5296页,《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传上·高昌》,第6222—6223页。

部分,这是唐太宗要经营西域所获得的实利。与中原和河西相比,西域不是手足,而同样是华夏根本。因而太宗进兵高昌,志在匡复汉以来中原王朝对西域的主权;在高昌设置州县,进而设置安西都护府,派兵镇守,就是要保护华夏根本。

同样经营西域,唐太宗与汉武帝的目的截然不同。贞观二十二年(648),面对络绎不绝来朝见的西域“诸胡使者”,唐太宗对臣下说:

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弊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①这是唐太宗自己就经营西域,与汉武帝进行比较。唐太宗的着眼点是“所获”,亦即所得到的实际利益。唐太宗认为自己超过汉武帝的所获,即“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使边远之地成为大唐国土。“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是唐经营西域的结果,也是经营西域的目的。

唐经营西域,“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并不是盲目开疆拓土,一味广地万里,而是出于国防安全的深谋远虑。易言之,是为了国家统一,四海宁一。《资治通鉴》卷194贞观六年(631)七月条云:

辛未,宴三品已上于丹霄殿。上从容言曰:“中外乂安,皆公卿之力。然隋炀帝威加夷、夏,颉利跨有北荒,统叶护据西域,今皆覆亡。此乃朕与公等所亲见,勿矜强盛以自满也。”^②唐太宗借鉴的对象与此前的皇帝不同。唐太宗并不是以中原王朝失德皇帝为鉴戒,而是强调了东突厥颉利可汗与西突厥统叶护的败亡,可见太宗的视野并不只局限在中原,而是具有欧亚视角。因而,考虑国家的安全,唐太宗也不只是从中原考虑,而是更着重“中外乂安”。正因为唐太宗战略视野辽阔,没有胡汉界限,秉持四海如一的理念,才坚定地认为高昌、西域是华夏的腹心与根本,只有有效控制西域,才能在内陆欧亚大背景下达达到“中外乂安”。因而,唐代经营西域,不是作为断突厥右臂之一环,而是作为国家欧亚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控制西域,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中外乂安”在唐太宗的战略思想中占据首要地位。《贞观政要》记载: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北狄代为寇乱,今延陀倔强,须早为之所。朕熟思之,惟有二策:选徙十万,击而虏之,涤除凶丑,百年无事,此一策也。若遂其来请,与之为婚媾,朕为苍生父母,苟可利之,岂惜一女!北狄风俗,多由内政,亦既生子,则我外孙,不侵中国,断可知矣。以此而言,边境足得三十年来无事。举此二策,何者为先?”司空房玄龄对曰:“遭隋室大乱之后,户口太半未复,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③

对待薛延陀,不论战争征讨还是和亲,唐太宗的目的都在“百年无事”、“边境足得三十年来无事”。百年、数十年的平安,边境无事,是唐太宗战略的着眼点。《资治通鉴》卷196贞观十五年(641)八月条云:

乙巳,上谓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惧。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虞,二喜也。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此一惧也。^④

太宗因“边鄙无虞”而喜,表明“边鄙无虞”唐治理国家的重要目的,而保证“边鄙无虞”,则是战略指导思想,是基本国策。

在内陆欧亚大舞台上,只有控制西域,才能真正做到“边鄙无虞”,长治久安。《新唐书·西域上》记载:

(贞观二十一年平龟兹)社尔凡破五大城,男女数万,遣使者谕降小城七百余,西域震惧,西突厥、安两国归军饷焉。社尔立王弟叶护王其国,勒石纪功。书闻,帝喜,见群臣从容曰:“夫乐有几,朕尝言之……四海宁一,帝王乐也。朕今乐矣!”遂遍觞之。初,孝恪之击焉耆也,龟兹有浮屠善数,叹曰:“唐家终有西域,不数年吾国亦亡。”^⑤

① 《资治通鉴》卷198,第6253页。

② 《资治通鉴》卷194,第6097页。

③ 《贞观政要集校》,第478—479页。

④ 《资治通鉴》卷196,第6170页。

⑤ 《新唐书》卷221上,第6231页。

这里,太宗之乐的原因值得深究。唐朝有西域,在太宗看来,达到了“四海宁一”,因而极度喜乐。易言之,唐控制西域之后,国家奠定了长治久安的基础,实现了天下太平的治国理念。这是唐太宗之乐的原因。以此推之,唐太宗重视西域、努力经营西域的原因和目的也就不难理解了。

史籍也记载了唐太宗经营西域的思想矛盾和反复,今略分析如下。《贞观政要》卷9《议安边第三十六》云:

至(贞观)十六年,西突厥遣兵寇西州,太宗谓侍臣曰:“朕闻西州有警急,虽不足为害,然岂能无忧乎?往者初平高昌,魏征、褚遂良劝朕立文泰子弟,依旧为国,朕竟不用其计,今日方自悔责。昔汉高祖遭平城之围而赏娄敬,袁绍败于官渡而诛田丰,朕恒以此二事为诫,宁得忘所言者乎!”^①

据此,似唐太宗曾后悔以高昌置西州。这条史料应如何理解呢?我们认为,《贞观政要》是开元中吴兢撰写的总括唐太宗君臣致治之道的著作,以太宗的居安思危、纳谏求治、慎始慎终作为帝王治国典范,有美化太宗的成分。置西州,是太宗力排众议的结果,也是少数拒谏的事例之一。用兵高昌,有违儒家以德治天下,不用兵扰民之旨,吴兢认为其是太宗帝德的污点,因而以太宗之悔来美化太宗,以示其善改过,不失明主本色。因而“方自悔责”是史家美化太宗之笔,不足为凭。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太宗对西域战略的反思。太宗检讨西域政策,发生在西突厥进攻西州之时。唐置西州,为边疆无虞,数十年甚至百年平安,而“西州有警急,虽不足为害”,亦与太宗励志求安的初衷相违。可见太宗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西州有警,打乱了太宗一战求百年平安的设想,使太宗意识到经营西域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但太宗并未真如史家所言,对置西州“方自悔责”,这从之后设立焉耆、龟兹督护府可见太宗政策的延续性,焉耆、龟兹督护府之设与置西州是一脉相承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太宗未在焉耆、龟兹设置州县,而是循序渐进,进而创造了新型的管理边疆地区内附其他民族的羁縻州制度,即是对置西州制度反思的结果。经过这种反思,唐太宗经营西域的措施才更加丰富和完善了。贞观天子最终建立了完善控制西域的制度,西域终为唐朝所有。

终唐前期,不论高宗、武则天,还是唐玄宗,都沿袭了唐太宗经营西域的理念和战略,唐经营西域的目的得以一以贯之。《旧唐书·西戎传》云:

则天临朝,长寿元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阿史那忠节大破吐蕃,克复龟兹、于阗等四镇,自此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既征发内地精兵,远逾沙碛,并资遣衣粮等,甚为百姓所苦,言事者多请弃之,则天竟不许。^②

面对吐蕃、突厥的威胁,武则天在国力不强时仍不放弃四镇,体现了武后对太宗西域政策的延续。

唐玄宗时期也是如此。开元天宝年间,唐更积极经营西域,其例不胜枚举,此不多论。兹引玄宗两份诏敕,对其西域策略加说明。《册府元龟》卷964《外臣部·册封二》略云:

(开元)十六年正月,封于阗阿摩支知王事、右武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尉迟伏师为于阗王。册曰:“践义立身,资忠成性……宜有褒崇,俾膺封建。今遣大理正、摄鸿胪少卿乔梦松册尔为于阗王。於戏!祇若顺训,聿修令德,无怠无荒,以保土宇。尔往钦哉!”又封疏勒阿摩支裴安定为疏勒国王。册曰:“维开元十六年,岁次戊辰,正月戊戌朔,十四日辛亥,皇帝若曰:万邦述职,无隔华夷,五等疏封,式固藩屏。咨尔疏勒阿摩支知王事、左武卫将军员外置裴安定,诞灵蒲海,禀秀葱山,蕴义以立名,蹈仁而成德。虽日月所照,莫非王土,而烽燧时警,犹曰虎庭,遂能扞彼边陲,归我声教。载阐畴庸之义,俾弘利建之风。今遣大理正、摄鸿胪少卿乔梦松册尔为疏勒王。於戏!允迪繇庾,勿替敬典,绥厥戎落,永为汉藩。尔往钦哉!”^③

从玄宗的诏敕看,于阗王的职责是“无怠无荒,以保土宇”;疏勒王的职责是“扞彼边陲,归我声教”。

① 《贞观政要集校》,第508页。

② 《旧唐书》卷198,第5304页;参《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传上·龟兹》,第6232页。

③ 《册府元龟》卷964,第11173页。参见《唐大诏令集》卷129《册疏勒国王文》,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95页。

于阗与疏勒都是唐的领土,其王之职为维护西域稳定,保证唐对西域的主权,“永为汉藩”。这是唐经营西域的实际目的,与太宗时经营西域所求实利是完全符合的。

唐代后期,杜佑借对汉冯奉世封爵一事的议论,总结了唐前期的西域经营。《旧唐书》卷147《杜佑传》云:

元和元年,册拜司徒、同平章事,封岐国公。时河西党项潜导吐蕃入寇,边将邀功,亟请击之。佑上疏论之曰:

(前略)夫蛮夷猾夏,唐虞已然。周宣中兴,猘狁为害,但命南仲往城朔方,追之太原,及境而止,减不欲弊中国而怒远夷也。秦平六国,恃其兵力,北筑长城,以拒匈奴,西逐诸羌,出于塞外。劳力扰人,结怨阶乱,中国未静,白徒竞起,海内云扰,实生谪戍。汉武因文、景之富,命将兴师,遂至户口减半,竟下哀痛之诏,罢田轮台。前史书之,尚嘉其先迷而后复。盖圣王之理天下也,唯务绥静蒸人,西至流沙,东渐于海,在南与北,亦存声教。不以远物为珍,匪求遐方之贡,岂疲内而事外,终得少而失多。

唐代经营西域,“不以远物为珍,匪求遐方之贡”,而是为了“亦存声教”,即汉文化进入西域,西域成为唐之一部分。如此,既免于汉武帝“疲内而事外,终得少而失多”之弊,又能“绥静蒸人”,保证天下之长治久安。

以上论述了唐代经营西域的目的。唐代经营西域的目的之所以不同于两汉,除汉唐内陆欧亚政治军事不同的大背景外,还有以下原因:

其一,唐代实行“关中本位政策”,使唐代的西域地位与汉代不同。

陈寅恪先生指出:

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盛强延及二百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藉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

唐关中乃王畿,故安西四镇为防护国家重心之要地,而小勃律所以成唐之西门也。玄宗之世,华夏、吐蕃、大食三大民族皆称盛强,中国欲保其腹心之关陇,不能不固守四镇。欲固守四镇,又不能不扼据小勃律,以制吐蕃,而断绝其与大食通援之道。当时国际之大势如此,则唐代之所以开拓西北,远征葱岭,实亦有其不容已之故,未可专咎时主之黷武开边也。^①

“关中本位政策”使唐重心在西北,保有西域,是唐之国策。因而唐倾全力经营西北,固守四镇,开拓西北。这与前朝视西域为手足、枝叶的认识截然不同。对唐而言,西域是防护国家安全重中之重,为腹心、根本,因而唐势必将西域纳入版图,开拓进取,将疆域推向更西,以确保实行“关中本位政策”的大唐帝国的长治久安。

其二,自汉以来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经营,奠定了西域归属唐朝的基础。

自汉通西域以来,西域与中原王朝联系日渐紧密,汉文化及汉族移民逐渐进入西域,促进了西域对汉文化和中原王朝的文化认同。以高昌为例,“(魏)孝明帝正光中,(魏)嘉遣使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燮以为博士”,接受儒家文化教育。长期汉化的结果,“其都城周回千八百四十步,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有《毛诗》、《论语》、《孝经》,历代子、史、集,学官弟子,以相教授”;“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大同”。^②也正因为高昌已与华夏文化上大同小异,因而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在高昌建立州县、实施唐各种制度后,并未引起当地百姓任何排拒和抵抗,而是顺利将高昌纳入唐统治管理区域。伊州的设立也是如此。而汉以来中原王朝长期的西域经营,奠定的西域中原认同,是唐顺利在西域建立州县、贯彻中央决策、实施各种制度的基础。

^①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33、137页。

^② 《通典》卷191《边防七·西戎三》,第5204—5205页。参见《魏书》卷101《高昌传》,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2244—2245页;《隋书》卷83《西域传·高昌》,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第1847页;《周书》卷50《异域传下·高昌》,第914—915页;《梁书》卷54《诸夷传·高昌》,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第811页。

四镇的建立,也是如此。兹引于阗为例。《通典·边防八·西戎四》记载,于阗“自汉孝武帝至今,中国诏令、书册、符节,悉得传以相付,敬而存焉”。《新唐书·西域传》也记载“自汉武帝以来,中国诏书、符节,其王传以相授。”这是汉武帝以来经营西域作用的显著例证。这些“诏书、符节”,不但是中原王朝与于阗联系的真实记录,而且也体现了于阗对中原王朝文化的重视。随着汉文化在西域的逐渐深入,唐在西域建立四镇,直接管理塔里木盆地南缘,也就水到渠成了。

其三,华夷一家的思想,成为唐在西域开拓进取的理论基础。

(贞观二十一年(647)五月)庚辰,上御翠微殿,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①此为太宗自道其功成名就的原因,值得重视。尤其是“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一句,更是千古一人之语,足以振聋发聩。唐代祖先虽非出自夷狄,但为赵郡李氏的破落户或假冒牌,受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的熏染,汉化程度并不高。^②隋末李渊携子居太原以抗突厥,其子孙深受突厥文化浸染,太宗华夷如一的思想,正是其认同突厥观念的体现。^③

也正因为认同突厥观念,太宗才能接受北方民族“天可汗”的尊号。《唐会要》卷73《安北都护府》略云:

贞观四年三月三日,分颁利之地……五年,阿史那阿咄苾败走后,其渠及首领至皆拜将军,布列朝廷,五品已上有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其后诸蕃酋长请上尊号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行天可汗事!”于是后降玺书赐西域北荒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酋长有死亡者,必下诏册立其后嗣焉。^④

《资治通鉴》卷198贞观二十一年正月条云:

丙申,诏以回纥部为瀚海府,仆骨为金微府……白霫为置颜州,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各赐金银缯帛及锦袍。敕勒大喜,捧戴欢呼拜舞,宛转尘中。及还,上御天成殿宴,设十部乐而遣之。诸酋长奏称“臣等既为唐民,往来天至尊所,如诣父母,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仍请能属文人,使为表疏。”上皆许之。于是北荒悉平。^⑤

“天可汗”为北方游牧民族对最高统帅的尊称。贞观四年,唐平定西突厥,成为北亚霸主,北方蕃族将原称突厥的“天可汗”称号给了唐太宗。这对北方诸族而言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中原王朝统治者接受这一称号,却与儒家文化不符。正因为有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的大背景,再加上李世民深受突厥文化浸染,才能自然而然地接受天可汗称谓。作为皇帝加天可汗,唐太宗自然能视华夷如一,而不会设夷夏之大防。唐太宗以大唐天子身份治理华夏,以天可汗身份管理夷狄,故而“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不但平定天下,而且创建了唐王朝博大恢宏的气势、兼容并蓄的开放性格。

回到对西域的论述上来,也正因为唐太宗视华夷如一,因而他能够在距长安万里之遥、蕃族人口众多的沙碛之地,建立唐朝州县,实行唐朝制度。以德抚之,可以变夷为夏,这是唐代经营西域的理论基础。而正因为唐代具有这种不限华夷的开放思想,唐治理下的西域才空前繁荣,真正成为唐之土宇,国之藩屏,达到了唐代倾全国之力艰苦卓绝经营西域的目的。

〔本文为作者与余太山先生合作承担“新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汉唐西域经营比较研究”课题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初阳)

① 《资治通鉴》卷198,第6247页。

②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11页。

③ 参见拙著《李渊子孙与突厥》,待刊于《欧亚学刊》新第3辑(总第13辑)。

④ 《唐会要》卷73,第1311—1312页。

⑤ 《资治通鉴》卷198,第6244—6245页。

Abstract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 and Architecture History of Zicheng in Region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ZHONG Chong**

Based on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recent investigation and archeology results ,this paper probes into Zicheng (a small city within a larger one) in region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It studies its distribution features and long time evolution process and discusses such problems as its origin ,formation background and genesis law.

Prototype Comprador during the Period of Sup Sam Hung in Qing Dynasty **ZHANG Xiao – hui**

The comprador system began to be gestated before the Opium War and was officially formed after it. It is the variant of Sup Sam Hung of Guangzhou and gradually replaced the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old itinerant traders in Sino – western trade. Opposite to the decline of Sup Sum Hung , the compradors finishe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and accelerat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intermediary or agent of Sino – western trade to modern entrepreneur.

Plight in Change: Probing into the Guarantee Credit of Private Lending in Modern Tianjin

FENG Jian

The guarantee credi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commonly used credit forms in private lending relationships. It is important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debit – credit relations and its repayment and also in the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of folk commercial market. The securer shouldered certain responsibility in this relationship and also got some earnings. However ,these earnings were not protected by the law. Besides ,there were frequent frauds in the process. Despite its significance in social credit ,all these factors increased risks and costs in the transaction and deteriorated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in the private lending of modern Tianjin.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of Social Group Network of Region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Modern Times – – focusing on Nan She **WU Qiang – hua**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associ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of gathering the collective strength and remolding social authority for the scholars to build the social interaction network. Nanshe (south association) is a scholar association with the largest scale and longest duration period of activity in late Qing dynasty. Nanshe held a number of activities to build their identity and awareness identification and sought to integrate cultural resource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ir social reputation and group equity.

Comparison on Purposes of Managing Relations with Xiongnu between Han and Tang Dynasties

LI Jin – xiu

The purpose for the Western Han and Eastern Han Dynasties to manage relations with the Western Regions (a Han Dynasty term for the area west of Yumenguan ,including what is now Xinjiang and parts of Central Asia) was to restrict Xiongnu ,an ancient nationality in China. But for Tang dynasty ,the relationship was

one part of the nation's Europe and Asia strategies , and the main purpose was to exercise sovereignty in Western Regions.

Imperial Yue Ling and Local Shi Ling in Dunhuang Regions in Han and Tang Dynasties

YU Xin , ZHOU Jin – tai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literature about shilling (season) in Dunhuang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wo kinds: one is Yueling issued by the central dynasty and the other is local Shiling generated according to the regional features of Dunhuang. The season knowledge shows difference in different regional scales. The nation's political symbolic meaning and folk practical meaning of season met in Dunhuang literature and formed two main aspects of season knowledge in Han and Tang dynasties.

On a Monk – folk Dispute in Hetuvidyā (Yinmin Studies) History

SHEN Hai – bo

When Hetuvidyā was first introduced into China , people had a lot of problems in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zing it. In 655 , the 6th year of Emperor Gaozong of Tang dynasty , a monk – folk dispute occurred when medicine official Lv Cai wrote a three volume book to question the Yin Ming Ru Zheng Li Lun Annotated by disciples of Xuanzang. This paper studies in details about this dispute and puts forth some new idea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views in this field in the academic world.

Patronizing the "Enemy Country": the Promotion and Proliferation of the Guan Yu Worship at the Jiangnan Area in the Ming Dynasty

BAO Shi – qing

From the Ming Dynasty , Guan Yu Worship gradually was out of its previously spontaneous and disorderly stage. Guan Yu Worship and Guan Yu temples penetrated like islands into vast Jiangnan area , and eventually incorporated the "Enemy Country" into its asylum system , thus facilitated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 Guan Yu Worship by the Qing central government.

Probing into the False Declaration Case about Purchasing Grain in Urumchi during the Reign of Qianlong Emperor

FANG Hua – ling

In the forty – seventh year of Qianlong (1782) , the false declaration of grain purchase in counties like Dihua , Urumchi was uncovered. The Qing government promptly prosecuted over 20 officials embezzling money of the national treasury. These officials , including high – ranking ones , were sentenced to death or removed from the office and confiscated property , even their sons and grandsons were severely punished.

Re – discussing the Assimilation of Immigrants into Pingxiang in Middle Qing Dynasty

LING Yan

Since the middle of Qing dynasty , a large number of immigrants got Hukou (registered residence) of Pingxiang , Jiangxi Province. But this kind of assimilation is different from that in early Qing dynasty. It is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such organizations as Tuhui , Jiahui and Yici , and needed to sign contacts on both the Jia and Tu levels.

On Gramophone Record and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China

GE Tao

Gramophones and records as new carriers recording voices were soon understood and accepted by Chinese after they were introduced in China. They had exerted wide and sophisticated influence on social urban life. In the meantime , with various political powers stressing publicizing functions of records , the world of gramophone records was also the world of politics. As historical records , gramophone records not only mirrored the popular culture of modern cities but also many aspects of social changes in modern China.